



THE
SPANISH
CIVIL
WAR

[英]
伯内特·博洛滕
Burnett Bolloten

戴大洪 译

西班牙
反
内战 [上]

**THE
SPANISH
CIVIL
WAR**

[英] 伯内特·博洛滕

Burnett Bolloten

戴大洪 译

西班牙内战
[上]

革命与反革命

THE SPANISH CIVIL WAR: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by Burnett Bolloten.

Copyright © 1991 by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Published in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27514 USA www.uncpress.unc.edu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New Star Press 20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 (英) 伯内特·博洛滕 (Burnett Bolloten) 著；戴大洪译。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1

ISBN 978-7-5133-2320-8

I. ①西… II. ①伯… ②戴… III. ①西班牙内战 IV. ①K55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7004 号

西班牙内战：革命与反革命

(英) 伯内特·博洛滕 著 戴大洪 译

出版统筹：向珂

特约编辑：杨露

责任编辑：汪欣

责任印制：李珊珊

封面设计：一千遍

封面绘画：吕欣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刚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010-88310888

传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88310811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660mm × 970mm 1/16

印张：92.75

字数：1202千字

版次：2017年1月第一版 2017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133-2320-8

定价：178.00元 (全三册)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西班牙革命是二十世纪的集体主义革命中最为独特的一场革命。它是唯一一场发生在西欧国家的全面的暴力革命，同时也是唯一一场由各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力量——它们经常相互竞争和敌视——所推动的真正意义上的多元革命，尽管最终共产党人逐渐掌握了控制权。西班牙革命还是唯一一场发生在某个大国的没有成功的重大革命，它被敌对的军事力量彻底挫败并扑灭。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西班牙革命从来没有受到对革命进行比较研究的学者们的关注，它本应受到这种关注。西班牙革命在二十世纪革命的研究领域相对而言不见经传的另一个原因是伯内特·博洛滕所指出的见解独到的“精心的伪装”，这是发生在多党派的人民阵线共和国政治框架——这一框架只是在内战爆发之后才被打破——内部的事实，由于革命在国外的支持者和宣传者将其描述成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事情，这一事实逐步显示出来。终于，在意识到西班牙内战和外国军事干涉的重大国际意义之后，它逐渐开始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由于二十世纪初期独特的历史状况，西班牙在最大的范围内爆发了革命。三十年代，与过去的一百余年一样，西班牙一方面是西欧大国中现代化水平最低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是经济落后的南欧（和东欧）国家中文明

程度最高、文化最先进的国家。

尽管马克思断言，在工业化的高峰期，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历史表明，在工业化的早期以及从早期到中期的过渡阶段，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社会更容易发生严重的冲突。工业发展初期微薄的工资收入和巨大的经济压力，加上被社会疏离的大批工人集中在新的城市环境中，形成了潜在的剧变条件，这些条件在工业化后期逐渐弱化。在西班牙，由于同时出现了现代社会的农民问题，社会反抗的可能性增大了——主要在这个国家的南半部，庞大的无地劳动者和赤贫者阶层人口激增，在十九世纪缓慢的现代化进程中，他们的经济状况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恶化了，因此，在二十世纪初期，他们的生活比旧政权统治的最后阶段其实或者相对来说更加贫困。

西班牙政治左转的趋势最初并没有受到现代民族主义的遏制。在另外一些国家里，民族主义是右翼势力动员的重要力量，但是，它在西班牙却鲜为人知，它仅仅存在于那些具有微弱的民族分离倾向的特殊地区，在那些地方，民族主义只是加深了社会和政治的裂痕。最初，西班牙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避免了巨大的国际压力对其国内政治发展的影响，它不与外国结盟，也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它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情况，几乎具有某种实验室的特征，对于西班牙来说，当时以及后来人们在其他国家所发现的那种全方位的现代冲突和潜在的社会政治斗争不是几乎没有产生作用，就是因国外的战争、占领或者任何形式的来自外部的明显压力而扭曲变形。

不过，某种间接的外来影响仍然是最终导致西班牙政体分裂进而崩溃的一个因素。这种影响不是通过直接施压或干预，而是通过西班牙各种主要政治角色之间的相互恐惧产生作用，当国内的对立越来越严重时，国外政治极端主义最恶劣的榜样开始在西班牙受到模仿，接着，某种西班牙式的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可以迅速取得胜利。西班牙内战爆发前夕，这种恐惧显而易见，它为采取最可怕的手段避免成为最激进的外国极端主义的西班牙同类的牺牲品提供了正当的心理依据，或者说，左派和右派的好斗分子逐渐开始这样认为。结果，尽管没有与外国结盟或是发生军事冲突，西班牙仍然以这种方式在心理上与欧洲其余部分的政治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它很容易受到那个时期最强大的政治压力的影响——实际

上，由于严重的国内分裂，它对此类压力的敏感达到了某种夸张的程度，尽管这是由西班牙人自己造成的。

如果说，按照苏联的标准，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在西班牙多少有点姗姗来迟，那么，与许多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情况不同，这场革命运动的发展最初并没有遭到强大的中央民族主义和右翼极端保守势力的反对。这反而导致革命者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忽视了潜在的社会底层保守势力比文明程度落后的俄罗斯更强大，同时忽视了三十年代西欧的国际均势与一九一七至一九二〇年间东欧的情况大不相同。在挫败革命的过程中，终于被佛朗哥调动起来的两种因素最终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它们是不太活跃的西班牙右翼底层力量和各种国际势力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西班牙内战——其间发生了革命——是三十年代欧洲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甚至也是西方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它对世界之所以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由于西班牙的国内冲突，不如说是由于列强的干涉及其以干涉相威胁，同样也是由于这场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其他国家非常紧张的政治局势。对于共和国的支持者来说，西班牙内战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为一场民主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而且，它实际上还变成了西方世界的一个独一无二的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当时法西斯主义的得寸进尺开始受到质疑。共和派控制区内部形势的实际发展状况往往不被西班牙外界所了解。西班牙内战刚一结束，人们几乎立即就把注意力转向了欧洲全面战争的进程，结果，多年以来，西班牙的这场战争仅仅被人们当作欧洲战争的序幕或注脚。

由于随后西班牙国内长达一代人的文化专制以及国外对于西班牙国内的政治和历史明显缺乏关注这种综合因素，在接下来的二十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对西班牙内战进行认真的研究。只是到了六十年代初期以后，随着一系列学术著作的发表，人们才开始以精确的历史视角仔细观察西班牙的这场斗争。

在这些新的专著中，唯一一部致力于研究共和派控制区革命派别内部斗争的著作是伯内特·博洛滕的《精心的伪装》，它是我们面前这本书的始祖，一九六一年由（伦敦的）霍利斯-卡特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完成了一个重大的学术突破，它第一次详细列举了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初的九个

月与共和派各主要力量的政治斗争有关的文献资料。它把发生在一九三六年七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的那些事情从宣传和党争的领域提升至得到文献资料充分证明的历史记录的水平，对无政府工团主义者、马克思统一工人党以及革命的社会党人在内战的最初几个月所进行的社会经济政治革命作了详细的描述，尤其是他们在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和莱万特地区进行的革命。

博洛滕这部著作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利用文献资料一步一步地证明了共产党在政治军事力量上的成长壮大。该书揭示了共产党势力的扩张，首先在共和国的中部地区，然后逐渐向另外一些地区发展，共产党对军队、警察和政府机构的影响力稳步增强。如果这是共和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派别的话，那么，充分说明它的情况尤其重要。如果不将所有重大事态发展公之于世，显然无法达到了解共和国历史的目的，因此，博洛滕所做贡献的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这项艰巨使命的先行者。重现并且认识西班牙刚刚过去的历史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实际上，这是知识分子非上不可的一课，也可以说，这是在西班牙有效而持久地重新建立民主国家的先决条件。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一漫长但却必不可少的历程中，博洛滕的著作迈出了值得关注的一步。因此，重建的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首任主席何塞·塔拉德利亚斯恰如其分地将其称为“已经出版的一万五千至两万种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然而，并不完全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精心的伪装》没有像它理应受到的那样受到历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的欢迎。这本书实际完成于一九五二年，但是，由于开辟了一个与通常的看法大相径庭的全新视角，它被许多美国出版社拒绝了，其中包括五家大学出版社。正如雷蒙德·卡尔在为一九七九年版的《西班牙革命》撰写的序言中所说，“也许书名不太恰当，伪装本身就是隐瞒事实，而挖掘事实真相正是一名富有献身精神的学者的工作，为了重现内战期间西班牙共和国混乱的政治局面，他千方百计地搜集各种可以利用的原始资料。”另外，霍利斯-卡特出版社坚持增加的副标题“西班牙内战中共产党的阴谋”也给人以错误的印象：这本书又是一件反共宣传品。

一九六一年出版后，这本书成为冷战狂热的牺牲品。尽管与作者的意

图或该书的主旨相去甚远，但是，由于被保守派和反共人士盛赞为揭露了共产党的阴谋和专制，它不仅受到共产党人和前共产党人的大肆谴责，而且还受到另外一些左翼人士和共和国支持者的严厉痛斥，认为它企图以某种方式诋毁污蔑共和派的事业。博洛滕的著作实际上有力地驳斥了右翼分子关于共产党人阴谋在一九三六年推翻共和国的指控。不过，仍然有人说该书作者是中央情报局或某种政治势力的代理人或枪手，而且，这本书在英国出版三个月后，巴塞罗那出现了一个完全误导读者的盗版版本，该盗版由长枪党^①人出版商路易斯·德·卡拉尔特出版，附有一篇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撰写的序言。尽管博洛滕竭力反对这个他称之为“仓促草率并被删改”的译本出版，但是，他还没来得及采取行动，该译本已经在西班牙面世。（一九六三年六月他在巴黎发表声明拒绝承认最初刊登在文献研究中心的刊物《通讯》上的这个译本。）^②由于一个经过准确翻译并且获得合法授权的西班牙文译本《西班牙革命：左派与权力斗争》的出版（墨西哥城，一九六二年），这种状况才得到纠正。两年后，斯坦福大学的西-美研究所出版了另外一个译本。

此外，伯内特·博洛滕不是一名受过训练的专业学者，也不是一位端着铁饭碗的大学教授。早年他当过合众社的通讯记者，后来作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和个体商人独立谋生，最终，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加利福尼亚的房地产业从事一份稳定可靠的职业。尽管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五年间他曾作为讲师在斯坦福大学短期任教，但是，自谋生计的需要大大减少了他可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这不仅将博洛滕第一本书的出版推迟到一九六一年，而且限制了他研究的范围，使其在七十年代从生意场上退休之前不可能取得更大的学术发展。

① 长枪党（Falange）为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政治团体。一九三三年由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创建，主要在对保守势力和革命党派均感失望的青年人中发展党员。最初三年，长枪党没有取得多大发展。一九三六年，长枪党参与发动反对共和政府的武装叛乱，当年十一月，普里莫·德里维拉被共和国政府处决。一九三七年，佛朗哥成为长枪党的领袖。佛朗哥死后，长枪党于一九七七年被正式取缔。（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② 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Manuel Fraga Iribarne，1922—2012）为西班牙政界人士，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以及随后的民主转型时期均为西班牙政坛的重要人物。在本段所述内容发生时，担任佛朗哥政府负责宣传的信息和旅游部长的弗拉加为具有倾向性的《精心的伪装》西班牙文盗版译本的出版推波助澜，因此，博洛滕特别讨厌他。

在此之后，他才有机会准备写作一部内容扩充了的专著，一九七九年，这部专著以英文和西班牙文出版，使用了一个更加贴切的书名：《西班牙革命》。他的第二本书保留了第一本书的所有优点，尤其是以大量原始资料为依据——实际上，这已使它成为其他历史学家的一本参考书或资料来源——及其严谨的客观性。《西班牙革命》对西班牙内战头十个月的政治斗争作了更加完整的论述，其中包括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巴塞罗那达到高潮的斗争以及对拉尔戈·卡瓦列罗的罢免，它不仅扩大了早期研究的范围，而且充实了大量新的材料。因此，在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整个研究领域里，它成为一部近乎完美的里程碑式的权威著作。

不过，在西班牙内战的后半程，政治活动依然存在，博洛滕收集了大量与此有关的文献资料，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将这些资料充分整理以供发表。八十年代，他专心致力于最终完成这项毕生的使命，开始写作我们面前的这本书。直到他漫长而非凡的人生的最后几个星期，博洛滕才将本书杀青。博洛滕最后留下的这第三本书是一部全新的著作，论及共产党的力量在一九三七年的僵持阶段以及进入一九三八年以后的发展壮大，尤其是在军队和警察中的发展壮大。像一九三八年两次内阁改组的情况一样，针对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和其他政治观点不同的左翼党派（主要是全国劳工联合会）所发动的攻击得到了详尽的描述。本书对内战后期共和国领导人胡安·内格林独特而复杂的人物形象作了描绘，比已经出版的其他任何著作更加完整、更为精细。本书对共和派最后阶段的政治活动给予了认真的关注，包括失败主义的滋生发展以及对共产党人的专制越来越强烈的反感。这部权威著作最后的贡献是对内战即将结束时那几个问题的深入研究：最终引起争议的共产党人对军事指挥权的重新安排，内格林和共产党人在推行没有落实的拼死抵抗政策的尝试中所扮演的角色，卡萨多试图推翻他们的密谋过程。

同时，本书的主要部分增加了大量因西班牙档案馆的改组整顿和全面开放而可以利用的新的文献资料。因此，本书不仅是一部更为厚重、更加完整的研究著作，而且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几乎属于权威性的颇有新意的描述，第一次从头至尾细致入微地对西班牙革命和共和派控制区的政治活动进行了全面而准确的考察。它竖起了一座将使未来的研究者永久受益的学

术丰碑，同时也为作者的不懈努力竖起了一座纪念碑。几乎没有什么人曾经在如此重要而艰巨的事业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同样重要的是，博洛滕将其收集的大量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留给了未来的历史学家，收集这些资料花费了他一生中的许多时间。收藏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博洛滕资料集包括两千五百册印本（其中许多是珍本），一万两千份装订成册的内战时期的报纸，十大本剪贴簿，大约十二万五千帧缩微胶片，超过六十七箱手稿和两大箱各种各样的文件。这一珍贵的资料收藏使其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三个西班牙内战研究的资料来源之一。伯内特·博洛滕留下的的确是一笔不朽的遗产。

斯坦利·G.佩恩

前言

伯内特·博洛滕去世之前没有来得及对这篇前言作最后的修改。不过，他留下书面和口述的说明，供整理完成其初稿时参照。与其基本上重复以前各种版本已经说过的话，我选择只列出与现在这本书有关的内容。另外，这篇前言是他的说明（由其夫人贝蒂和儿子格雷戈里记录）和早期草稿的忠实再现。

乔治·埃森魏因

一九七七年，我开始动笔撰写摆在面前的这本书，它包含了将近五十年的调查探索和分析研究。最重要的是，本书反映了我广泛使用大量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报纸刊物的情况。与那些尚未意识到报纸作为原始资料之重要性的历史学家不同，我坚信，如果不以查阅报刊的方式触摸内战参与者的生活，就不可能理解他们的激情、冲动以及真正的问题之所在。我发现，报纸比其他任何资料来源更清楚地反映了卷入这场可怕战争的众多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的看法和感受。多年来，我查阅了近五百种报纸和期刊（有些刊物报道内战多达百期）。为了再现当年那种乱世的气氛，我直接引用了两百多篇不同的报道。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明显扩大了研究的范围。我搜集了大量新的资料，包括报纸、刊物、书籍、小册子、缩微胶片和原始文件的影印件。这些资料大部分是从设在美国国内外的研究性图书馆以及公共和私人机构中找到的。

对于这些资料在提供素材和释疑解难方面给予我的无法估量的帮助，我想向本书《致谢》按字母顺序列出的那些个人、机构和出版社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但是，在此我必须专门提到为完成这部专著提供了特别帮助的一些人。

我为乔治·埃森魏因博士的友谊及其八年来的可贵帮助向他表示深深的谢意。他一次又一次地将其利用图书馆馆际出借制度从斯坦福大学格林图书馆和胡佛研究所图书馆与档案馆借到的成百上千种书籍和文章送到我家，为我节省了难以计数的工作时间。这种帮助使我得以广泛研读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的那些与三十年代欧洲外交史有关的出版物。因此，我才能够详尽阐述较早时候我在《精心的伪装》和《西班牙革命》中曾经阐述过的同一个极其重要的主题。我非常重视我与乔治长期以来所进行的讨论，并且把他当作一位可以征询意见的朋友。除了别的意义之外，就一些错综复杂而且具有较大争议的问题而言，这些讨论有助于我充实想法、巩固信念。另外，我还要为摘录他的文章及其专门为我撰写的大量注释向他表示感谢，读者将在多个章节读到他的这些注释。

我要感谢斯坦利·G.佩恩教授对本书的坚定支持及其不可或缺的贡献。除了为本书撰写序言之外，他还慷慨地腾出时间复审了原稿。[由于本书作者无法独力完成最后一章，佩恩教授费心帮助撰写了结尾的部分内容。]

特别感谢斯坦福大学的罗纳德·希尔顿教授，他是我交往二十七年的老朋友，如今是加利福尼亚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希尔顿教授不仅始终以其富有感染力的干劲和朝气鼓励我，而且允许我利用其无与伦比的西班牙语文化知识。多年来，希尔顿教授一直是我的研究的强有力的倡导者，我最为感谢的正是这一点。

为其过去二十五年坚持不懈的精神支持和帮助，我要感谢巴黎美国学院的戴维·温盖特·派克博士。

哈佛研究所的希丽娅·库克多年来慷慨地向我提供了帮助，她从图书馆和档案馆找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文献资料并将来自苏联的重要的原始资料精心翻译过来供我在研究中使用。

我要感谢两位西班牙人，他们真心实意地与我共同努力在西班牙出版本书和我以前的著作。近二十五年来，卢西亚诺·纳瓦斯一直为我提供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最新文献，佩德罗·F.格兰德则热心地支持《精心的伪装》和《西班牙革命》的出版发行。

一九三八至一九五二年间，格拉迪丝·艾薇·博洛滕以其奉献精神 and 辛勤工作帮助奠定了我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全部著作赖以问世的基础。

在为出版编辑书稿的过程中，葆丽娜·B.图克夫人（打字稿）、芭芭拉·沃克夫人（参考文献）和默娜·B.罗切斯特夫人（索引）的认真工作对我助益良多。最重要的是，图克夫人是一位出色的编辑和打字员；在编辑过程的最后阶段，她那不同寻常的高标准及其审阅书稿时的深切关注和忠心支持对我具有很大的帮助。

我要向以下人士致以特别的谢意，他们欣然同意阅读极不便于阅读的大约两千页书稿并且给予有益的评论：保罗·阿夫里奇教授，刘易斯·贝特曼（编辑，北卡罗来纳），哈维尔·普拉德拉（编辑，马德里），斯蒂芬·施瓦茨，保罗·西伯里教授，琼·康奈利·厄尔曼教授和艾拉·沃尔夫。

贝蒂和格雷戈里·博洛滕事事处处尽一切力量支持我。他们以各种方式帮助我，并且为这部书稿无私地奉献了大量时间。本书得以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感谢他们的全身心投入。

尽管作者对上述个人和团体的贡献致以谢意，但是，就本书表述或暗含的最后结论而言，他仍然需要文责自负。

作者说明

曾经查询过的图书馆及其他机构

本书准备使用的所有资料均可以在下列某个或多个图书馆和机构所保存的书籍、信函、文件、访谈录、报纸、期刊缩微胶片及剪报中找到：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历史档案馆，马德里

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

国家历史档案馆，萨拉曼卡

国家图书馆，马德里

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巴塞罗那

国家图书馆，巴黎

布兰代斯大学，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

大英博物馆报纸图书馆，伦敦

当代历史研究中心，巴塞罗那

国际无政府主义研究中心，日内瓦

历史-社会文献中心，巴塞罗那

国际历史研究中心，地理和历史学院（毛林-宁研究室）

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基金会，马德里
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马德里
哈佛学院图书馆，马萨诸塞州剑桥
马德里市期刊阅览室，马德里
国家期刊阅览室，马德里
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博洛滕资料集）

巴塞罗那市历史学会，巴塞罗那
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阿姆斯特丹
国会图书馆，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文化部，马德里（文献资料档案中心）
纽约公共图书馆，纽约
公共档案馆，英国里士满
军事历史部门，马德里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斯坦福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
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图书馆（索思沃思资料集）
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密歇根州安阿伯（拉瓦迭资料集）
内华达大学里诺分校巴斯克研究计划

注释说明

通常，如果某位作者仅有一部著作或小册子列入参考资料，那么，这部著作在每一章节被首次提到后，注释中就只能写作者的名字。如果参考资料包括同一位作者的多部著作，注释中将写出完整或简化的书名以保证准确说明。

在正文和注释中引用的所有报纸和期刊的出版地均在参考资料中写明。对于具有相同名称的报纸和期刊，为了准确辨别，其出版地也在注释中写明。

参考资料写明了所有被引用的文件资料的准确出处，无论是原始资料还是副本。

敌对双方的名称

最初我把佛朗哥将军的军队称为“叛军”或“反叛者”，后来我又将其称为“民族主义者”。军事叛乱的支持者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建立自己的政权之后使用了后面这个名称。

另一方面，我在全书交替使用“反佛朗哥力量”、“左翼势力”和“共和派”等名称。尽管考虑到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以后发生在战线两侧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变革，诸如“民族主义者”和“共和派”之类名称的政治准确性也许应当受到质疑，但是，这些专用名词仍为大多数研究西班牙内战的历史学家所使用并且具有简单明了的优点。

地名

本书使用了下列地名的英式写法：

Andalusia (Andalucía, 安达卢西亚)

Extremadura (Extremadura, 埃斯特雷马杜拉)

Castile (Castilla, 卡斯蒂利亚)

Navarre (Navarra, 纳瓦拉)

Catalonia (Cataluña, 加泰罗尼亚)

Saragossa (Zaragoza, 萨拉戈萨)

Cordova (Córdoba, 科尔多瓦)

Seville (Sevilla, 塞维利亚)

为了与英式写法保持一致，西班牙语地名的重音符号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省略了。例如，Aragon: Aragón (阿拉贡)；Cadiz: Cádiz (加的斯)；Malaga: Málaga (马拉加)。

正确的姓名

索引中西班牙人的姓名按照西班牙语写法以父姓顺序排列。例如，与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有关的内容将在其父姓拉尔戈而非母性卡

瓦列罗项下找到。不过，我时常称其为卡列瓦罗，在西班牙语原始资料的引文中往往也是如此，当时，朋友和对手经常这样称呼他。

加泰罗尼亚名称

加泰罗尼亚人的姓名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是相应的西班牙语写法，例如，Juan Camorera；Joan Comorera（胡安·科莫雷拉）；Luis Companys；Lluís Companys（路易斯·孔帕尼斯）；Federico Escofet；Frederic Escofet（费德里科·埃斯科菲特）；José Tarradellas；Josep Tarradellas（何塞·塔拉德利亚斯）。加泰罗尼亚名称的一个明显例外是正文中通篇使用的Genaralitat（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

缩写及其他简称

AHN	Archivo Histórico Nacional, Madrid and Salamanca（国家历史档案馆），马德里和萨拉曼卡
AIT	Asociación Internacional de Trabajadores（国际工人协会，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国际）
BL	Bolshevik Leninists（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列昂·托洛茨基第四国际的西班牙支部）
BOC	Bloque Obrero y Campesino（工农集团，一九三五年与共产党左派联合组成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CADCI	Centre Autonomista de Dependents del Comerç i de la Industria（工商业雇员自治中心，加泰罗尼亚的办公室雇员和商店店员工会）
CEDA	Confederación Española de Derechas Autónomas（西班牙争取自治权利联盟，右翼天主教党派联盟）
CI	Communist or Third International（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
CLUEA	Consejo Levantino Unificado de la Exportación Agrícola（莱万特地区农业出口联合委员会，巴伦西亚地区由全国劳工联合会控制的农产品出口组织）
CNT	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全国劳工联合会，意识形态受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引导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联盟）
Comintern	Communism International or Third International（共产国际或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或共产国际“支部”联合起来的由莫斯科控制的世界性共产